

上海持续提升工业效益研究

张亚军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 200032)

【摘要】: 上海持续提升工业效益的总体思路是:加快新兴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创造和培育新增长点;稳定企业投资预期,促进工业投资加快回升;加强前沿技术跟踪预测研究,提高发展动能;优化产业组织生态体系,为工业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创新产业跨界治理体制,以有效制度供给推动工业动能再造;完善顶层设计,推动郊区工业布局的优化、融合发展。

【关键词】: 工业效益 新兴产业发展 工业投资 工业布局

【中图分类号】:F40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8)09-0047-010

一、上海工业效益现状

(一)综合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1. 工业规模经济效益迈上新台阶。

从总量看,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实现大规模增长。2016年,资产总计达39838.24亿元,年均增长率达9.42%。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税金总额分别实现34315.15亿元、2913.91亿元、1984.05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1.03%、13.37%、11.61%。从单位规模看,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经历了“倒U型”变化,但企业的单位规模效益实现翻倍,且高于全国水平。2016年,户均资产规模为4.77亿元,比2000年增长3.28倍,是全国户均资产规模的1.69倍。户均主营业务收入、户均利润和户均税金分别为4.11亿元、0.35亿元和0.24亿元,为2000年的5.41倍、7.54倍和5.87倍,均明显超过全国的水平。

2. 工业投资效率呈稳步提高态势。

上海工业投资产出比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2001—2015年,上海工业投资产出比从11.99稳步增长到34.70,除2004年小幅回落0.05个点、2009年回落0.79个点、2012年回落0.70个点外,其他年份均保持增长,且整体波动较小。分阶段看,2001—2006年平均为14.64;2007—2012年平均为20.90,比前一阶段提升6.26个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13个点;2013—2015年平均为30.20,比前一阶段提升9.30个点,2013—2014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4.69个点。

3. 工业经济的盈利能力明显增强。

投资利润率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且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2007年上海工业投资利润率从69.75%提升至95.29%;2008年大幅回落至68.21%;2009—2011年回升,从100.82%升至175.68%;2012年小幅回落至166.29%;2013—2015年连续大幅增长,从195.35%升至276.92%。2000—2016年,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提高3.15个百分点,达12.60%。2016年,上海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35.42万元/人,是2000年的4.36倍,若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增长11.86%。从工业企业主营成本增长

的趋势看,近几年上海这一指标一直在低位运行,2016 年为负增长,这表明上海工业降成本的成效比较显著。与此同时,上海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近几年处于上升阶段,2015 年达 8.32%,超过全国 6.42%的水平,并且这一优势还在继续扩大,这意味着上海工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覆盖掉成本的约束,获利能力明显提高。自 2000 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由 6.09%提高到 8.49%,销售利润率由 6.00%提高到 9.38%,销售税金率也由 5.24%提高到 6.39%⁽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年均增长率为 9.43%,2016 年的所有者权益比 2000 年增长了 3.23 倍。

4. 工业部门去杠杆取得积极成效。

上海工业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明显提高。近年来,上海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6 年资产负债率为 49.17%,比 2008 年降低 4.76 个百分点,且低于全国的水平(55.87%),工业部门去杠杆取得积极成效。

(二)科技要素投入作用凸显

1. 工业投资增速进入下行通道。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上海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 2001 年的 651.05 亿元增加至 2010 年的历史最高值 1422.08 亿元,此后继续保持 2 年高位后开始呈下滑态势,2015 年降至 957.17 亿元。这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内外市场需求疲软不振,导致投资环境谨慎低迷;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上海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化,上海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经济发展迅速,传统工业行业去产能步伐加快,重化工业高速增长期进入拐点,新旧产业处于转换衔接阶段,工业结构由“重”到“新”,导致工业投资必然下降。在全球供应链整合、新产业革命大背景下,上海工业领域投资呈现新的变化趋势。上海大型工业企业集团已开始并还在不断强化市外投资、境外投资和股权投资,制造环节投资在本市不断弱化,研发、销售环节不断强化。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环节,因此未来上海工业投资疲弱态势仍将持续。

2.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快速增长。

2015 年上海工业技改投资 564.70 亿元,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59.00%,比 2006 年提升 14.59 个百分点。2006—2015 年上海技改投资平均增速 3.00%,高于同期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3.08 个百分点,除 2008 年和 2011 年外,其他年份技改投资增速均高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阶段看,2007—2012 年投资额平均为 714.47 亿元,比 2006 年提升 179.47 亿元,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平均为 52.08%,比 2006 年提升 7.68 个百分点;2013—2015 年投资额平均为 646.80 亿元,比前一阶段减少 67.67 亿元,比重平均为 57.92%,比前一阶段提升 5.84 个百分点。技改投资比重上升主要是由于当前上海可用于工业投资发展的工业用地储备不多,土地价格、房屋价格和办公楼租金等经营性成本不断上涨,企业新建投资占比下降,技术改造投资占比上升。

3. 工业“软”投入正不断上升。

工业企业对“硬”投入的依赖度减少,投资重心逐渐转向研发、数字智能、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软”投入。研发投入带来的技术进步逐步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2015 年上海工业行业研发经费 474.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57%,增速高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22.77 个百分点,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49.55%,比 2005 年提升 37.84 个百分点。大型企业集团信息化、数字化改造不断推进,2012—2015 年上海电气信息化投资形成资产总额 7.41 亿元。

(三)传统产业不断升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

从投资结构角度来看工业内部结构可以发现,上海工业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逐渐从传统行业转向新兴产业,工业高端化和高技术化发展趋势显现。从 2007—2012 年和 2013—2015 年的工业投资行业分布变化情况看,8 个行业投资比重“五升三降”。比

重提升的行业有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石油化工、信息制造、航空航天(按比重变化从大到小),分别提升 4.75%、3.88%、3.53%、2.55%、2.01%;比重下降的行业有消费工业、钢铁有色、装备制造(按比重变化从大到小),分别下降 8.16%、5.32%、3.59%。从 2007—2012 年和 2013—2015 年的工业投资增速情况看,8 个行业增速普遍下降,其中 2007—2012 年生物医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平均增速高于工业整体水平;2013—2015 年钢铁有色、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平均增速低于工业整体水平。从新兴产业发展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2016 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实现总产值 4182.26 亿元,同比增长 5.0%。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21.0%提升至 28.2%。未来随着科技创新的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对上海工业经济贡献将进一步提升。

(四)工业经济效益提升的社会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1. 工业绿色转型呈现良好态势。

实施绿色制造项目。围绕绿色设计平台建设、绿色关键工艺突破和绿色供应链系统构建,实施一批系统集成项目,累计 12 个项目获批立项,居全国首位,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2.17 亿元,拉动企业绿色改造投资 22 亿元。启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3 家企业入选国家第一批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名单,其中,绿色工厂 2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 家;1 家机构入选首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5 个园区开展绿色园区创建试点,实施绿色监测、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重点工程。推进绿色低碳试点。

2. 工业节能降耗做出重要贡献。

工业用能实现“双降”。2016 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 2012 年下降 14.1%,工业能源消费总量下降 100 万吨标煤,占全市能源消费比重下降 4 个百分点。2017 年 1—11 月,规模以上工业用能同比减少 119.8 万吨标煤,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9.7%。工业污染治理迈出新步伐。全面削减分散燃煤,2013 年至 2017 年三季度,累计完成 5153 台分散燃煤(重油)锅炉和工业窑炉的清洁能源替代或关停,减少分散燃煤约 300 万吨、重油 1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171 万吨,带动了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工业天然气消费占比从 3.8%上升至 7.6%。推行清洁生产先进技术工艺,在钢铁、石化、电力等 12 个重点行业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完成 868 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改造 4617 项,节能 18.5 万吨标煤,节水 364.3 万吨。工业用水和废水处理取得重要进展,2016 年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相比 2012 年下降 17.7%,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0%以上,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氨氮、化学需氧量等主要工业污染物相比于 2012 年分别下降 72.3%、65.1%、34.8%、45.0%,减排成效显著。

二、上海工业效益持续提升面临的瓶颈制约

(一)高度依赖汽车制造,效益提升缺乏新的动力

在上海经济呈现中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一直处于下降的通道,这表明制造业的增速远远低于第三产业,服务经济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也说明制造业的发展缺乏新的动力支撑,面临严峻的挑战。从 21 世纪初开始,由于国内外需求下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缓慢以及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等因素影响,上海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滑,2016 年下探至 26%,更为严峻的是产业内部结构陷入新旧动能转换接续困境。2016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速低于 GDP 的增速,其中制造业的增速更是只有 2.7%。传统的六大重点行业增速不到 2%,大多数行业的增长都为负,唯独汽车制造业一枝独秀。上海工业效益对汽车制造业形成高度依赖,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且抗风险能力低。目前全国汽车市场正处于调整阶段,上海汽车制造业要保持持续快速增长面临较大挑战。

(二)投资呈趋势性下降,产业资本集聚效应不强

2016 年和 2017 年,上海工业投资仅分别同比增长 2.3%和 5.4%。总体看,目前企业主体及社会资本投资工业的意愿仍处于较

低水平,未来上海工业投资疲弱态势可能还将持续。一是投资增量后劲不足,工业规模稳定增长的驱动力量减弱。上海资本密集型产业产能过剩,资本投入产出比率较低,投资增长乏力。钢铁、船舶、汽车等重点产业产能逐渐进入饱和期,未来增长空间有限。二是外资进入潜力有限,工业外向化发展模式受阻。随着上海商务成本不断提高,上海引进外资进入转型期,低成本加工制造业对外资吸引力逐渐下降,工业高速增长所依赖的强大外部动力削弱。三是产业资本集聚效应不强,工业重点领域控制力不强。上海工业领域资产集中速度较快,但产业资本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控制力和影响力有限,特别是缺乏具有行业引领力的企业集团和企业家,在重点领域内的控制力与其规模不相匹配。

(三)创新内生机制尚未形成,缺乏核心技术支持

上海工业“依赖国企”“依赖外资”较为严重。2011—2016年,国有控股工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保持在35%以上,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保持在60%以上。外资企业受其母公司全球战略控制,技术创新主要在“体内”循环,溢出效应有限,创新能级不强;国有资本掌握较多的创新资源,但创新的动力并不足;而作为技术创新重要力量的民营企业的创新氛围长期受到压抑,短时期难以承担创新主角的重任。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外商独资企业占比高达80%以上,且多年来一直维持着这种趋势。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进料加工贸易的比重在60%以上,这表明许多关键的中间产品依然依赖国际市场,自主能力不强。上海研发投入尽管企业投入占比较高,但企业投入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还较低,2015年规模以上企业占比只有1.39%,远远比不上欧美国家企业占比2%以上的水平。受制于研发经费不足,上海在科研创新方面,整体科研成果数量并不少,但质量仍有待提高。企业往往倾向于将创新的重点放在跟踪和模仿上,原始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导致自主创新能力效率不高。尽管上海在消化吸收费用上总体呈上升态势的增长,但在总量上依旧不高。低的消化创新能力就导致了引进的技术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落地”即技术的本土化,只是将其作为生产手段,没能实现技术上的再创新与超越。

(四)产业融合发展亟须增强,产业布局亟待优化

工业效益的内涵之一在于是否拉动其他产业发展。通过对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联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均呈现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反馈效应的态势,这表明在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相对独立,内生发展效应贡献相对较高,而产业间的融合效应还未得到提升。在溢出效应方面,制造业要大于服务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服务业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的绝对值还偏低。制造业是服务业的重要需求部门,制造业的分工深化会对服务业特别是对研发服务、咨询、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增加,会促进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这表明上海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在分工上走向深化,在当今全球分工进一步深化以及制造服务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依然粗放、转型依旧缓慢。因此,上海经济转型的动力要提升制造经济驱动能力,制造业在创新发展、深化分工、价值链方面应该率先实现升级,这不仅能提高制造的效率,而且也是提升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工业整体效益水平的重要方面。此外,上海工业的产城融合程度尚不理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效益的持续提升。虽然各区这些年来持续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总体发展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除路途遥远、上下班交通不便外,与市中心便利的生活设施、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水平和优质的子女就学条件等相比,郊区总体上在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上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三、发达经济体工业效益持续提升的经验

(一)美国工业效益持续提升的经验

1. 利用市场机制,推动技术创新。

(1)加强创新网络建设。美国国家创新系统是由企业、大学、联邦科研机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各级政府以及中介服务机构等构成高度成熟的“官产学研”互动网络。官产学研各类机构互为补充,密切互动,形成高效运行的有机整体。政府科研机构倾向于国防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私营企业的科研创新主要以市场为导向;高校的科研创新主要立足于基础研究,受政府

资助较多;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则代表公共利益,立足于上述各主体没有关注的公共产品研发。(2)创新产业政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创新产业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一是风险投资政策,为尚未投产面市的已有或潜在科技成果或创意提供创业启动资金;二是创新聚集园区,为接受风险投资的中小高新科技公司提供具有要素聚集功能的研究、开发、生产、经营基地;三是创业融资市场,对具有广阔市场前景而缺少发展资金的高新科技公司提供上市融资的股票交易市场,对公司实施的股票期权、员工持股计划等股权激励措施给予免税、减税政策。(3)深化创新,化解过剩产能产业。从供给侧看,美国综合应用产业深化创新和培育产业竞争力、结构调整等政策,把优化新兴产业发展的竞争环境,促进清洁能源、生物、空间技术、医疗等优先领域突破发展,夯实创新型人才、科学研究、基础设施等要素基础作为化解产能过剩的重点。从需求侧看,美国采取多种途径扩大国内和国际市场,以市场容量提升化解产能过剩。对内鼓励消费,加强国内领先市场培育;对外加大贸易保护和区域性经贸合作安排,强化国际市场主导权。(4)加强人才资源建设。提升公众对制造业职业的兴趣,努力改变公众对制造业的认识偏差;加强先进制造业的大学项目,增加相关的教育模块和课程,增加制造业方面的奖学金和实习机会,培养先进制造业急需的技能人才;投资社区大学教育,发展伙伴关系提供技能认证,缓解制造业人才严重不足的困境,为制造业规模扩张和创新发展提供持续有效的人才资源支撑。

2. 完善市场经济,激发市场活力。

(1)构建较完善的市场体系。美国的市场体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相当完善。它既包括一般商品市场,如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也包括各种特殊的商品市场,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2)差异化不同规模企业的激励机制。美国对大公司和中小企业区别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激励机制。在进入新经济时期后,政府大力扶持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支持、鼓励大公司采取包括通过并购扩大规模等各种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竞争。对于广大的小企业,政府更多地采取直接帮助的方法。(3)健全市场监管,降低交易成本。一是美国推行专利制度改革。2011年通过的《美国发明法案》、2013年实行的“发明人先申请制”,强调加强专利审查、专利信息更新、政策宣传以及知识产权意识培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二是美国重视网络安全和生物安全。2013年,美国政府颁布总体令,提出要加强网络安全,提高关键基础设施的恢复力,保持一种良好的网络环境,鼓励高效、创新和经济繁荣,同时加强安全、商业机密、隐私和公民自由保护。

3. 改善营商环境,增强竞争实力。

(1)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美国各级地方政府相继成立投资服务机构,帮助投资者成立公司和引进技术。这些机构规模不大,但承担多项政府职能,免费提供广泛的投资服务。如果投资者不能从机构的官员处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可通过该机构向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长寻求帮助。(2)控制区域竞争。为减少地方政府间在招商引资时过度竞争造成的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美国各类政府对招商引资竞争加以控制。联邦政府在税法当中禁止地方政府以发行免税债券的形式为投资者提供资金支持,以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限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行为。(3)发展集群经济。美国地方政府通过各类经济园区的建设,将本地区急需的投资项目吸引过来,并且聚集在特定的发展区域中,向其提供优惠政策和投资服务,形成“集群经济”。(4)吸引制造业回归。推进税收改革,吸引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发展;强化政策修订与完善,不断优化先进制造业政策体系;改革贸易政策,推动制造业出口和提升国际竞争力。2010年8月,《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较大幅度降低了生产企业的进口零部件成本,以增加就业。2012年2月,政府再次推出企业税改方案,加大减税幅度,鼓励在美国本土投资,创造本国就业机会,同时大幅减少海外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并先后推出“购买美国货”和“五年出口倍增计划”。

(二)德国工业效益持续提升的经验

1. 健全法律法规,转变创新体系。

(1)逐步优化创新体系。德国创新驱动,经历了高校引领、机构集中、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历程,体现了政府以市场为核心,提供资本、培育环境与建构结构的职能。一是渐进式创新体系。创新概念在德国,主要针对生产流程和已有产品的持续改善,从而提升产业价值和投资回报。进入21世纪后,德国自19世纪形成的官产学研创新体系随着技术进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改变,

创新发展包括机械化发展的“工业 1.0”阶段、电气化发展的“工业 2.0”阶段、信息化发展的“工业 3.0”阶段。二是激进式创新体系。首先,科研体系国际化。2008 年,德国建立国家工程院与国家科学院,加入国际科学组织网络,促进国际合作;2010 年,制定《2020 高科技战略》,聚焦全球挑战,确定气候与能源、健康和通信等国际领域。其次,解决高校与公共研究机构条块分割问题。2006 年,政府整合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的管理部,出台“高校公约”“研究与创新公约”及“精英计划”,促进协同创新,培养基础人才。再次,多措并举助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2008 年,联邦政府启动“中小企业核心创新计划”,支持中小企业研发项目申请,到 2012 年时,与高校合作的创新中小企业占全部创新中小企业 42.9%,与科研机构合作的比例达 39.9%。政府依托创新聚集,使企业根据价值链逻辑聚集,融入全球价值链。(2)驱动化工产业绿色转型。一是政策法规驱动。德国政府针对化工企业出台系列法规,严格控制企业对环境的影响。1970 年代德国政府出台《垃圾处理法》,1990 年代初德国议会将保护环境的内容写入《基本法》。同时,德国遵守欧盟颁布的相关法规,加入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白色认证等国际环保机制。此外,德国的 16 个联邦州和各地方政府设置官方环保机构及众多跨地区的环保研究机构。德国的环保警察可以在发现环境污染时立即采取相关行动。(3)人才培养。德国具有相对稳定的劳资关系,企业投入较多资金培训员工,在保证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保证技术进步的持续性。德国政府建立人才旋转门制度,促进人才跨界循环。修订《移民法》降低紧缺人才移民门槛,改善科研人员职业稳定性与优越性,吸引海外人才。进入“工业 4.0”阶段后,政府加大力度吸引培养人才。立法延长公立科研机构研究人员聘期,吸引青年人才;强化职业教育,促使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地位平等,打通高等教育者深造渠道;大力发展跨学科与跨界培训,以企业需要为核心,加强职业训练、学术训练与在发培训互动,实现理工、工商管理与法学互动。

2. 完善市场经济,降低交易成本。

(1)创设组织化模式。银行对企业长期定向投资。通过信贷、持有公司股票、接受企业股东委托和参加董事会,国家支持的银行在确定这些企业的产业方向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战略使各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2)建立工业企业联合体。在德国制造业中,每家大企业几乎都有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供应商,这些中小企业从大企业获得订单和技术并向大企业提供设备零配件。(3)稳定劳资关系。稳定的劳资关系是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更是德国经济治理不可或缺的基础。德国政府从 1990 年代以来对福利和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增加了市场的灵活性,减少保护主义倾向。(4)加强框架规制。在金融监管方面,德国政府严苛的法规使金融机构的投资回报率较低。2001 年,德国政府取消对储蓄银行的政府担保。德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率逐年下降。2013 年 2 月,德国政府出台新法案遏制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投机,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监管。当商业银行从事自营资金交易谋取超额收益时,必须对其相应的高风险独立承担全部责任。

3. 提高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

(1)多元化招商引资机构的组织模式。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为进入德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和支持,并协助在德成立的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根据企业的需求推荐多个投资城市,做出选址分析,将企业转给意向城市的经济促进局。(2)丰富激励机制降低成本。一是投资补贴。德国除了提供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可以提供投资者部分“投资补贴”。由于不能违反公平竞争原则,具体各城市补贴多少由欧盟、德国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确定,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补贴越少,总补贴不超过投资额的 40%。另外,由于更看重投资对就业的拉动,德国政府对外国企业和德国企业一视同仁。二是税收政策。2008 年 1 月 1 日起,德国实施新的税收政策,公司税从 38%降到 29%~30%,处于发达国家的中下游水平。

(三)日本工业效益持续提升的经验总结

1. 健全制度体系,实现科创驱动。

(1)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1995 年,日本确立“科技创新立国”为基本国策。随后,日本持续加大科技研究投入,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改善研究开发环境,切实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一是统揽指导制造业创新全局。日本以“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为核心,总体把控与横向连接各部门,推进科技振兴与创新政策一体化。二是构建区域性产学研合作创新系统。日本以“产业集群

计划”为抓手,构建区域内产学研横向合作创新网络。地方政府组织各创新主体讨论、制定产业集群计划,并设立计划推进机构。三是企业为技术研发创新主体。实施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制度,每年制定补贴及委托费目标额度,发布技术创新支持方向,按创新阶段择优选择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四是技术转移机构促进成果转化。高校采用会员制,牵头组建技术转移机构,以股份制形式运营。机构代表政府,负责发掘选择可进行产业化的高校科研成果,及时向民营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在成果转让时,机构向企业承诺专利的专用实施权,并将收取的专利使用费案例比返还给高校及科研机构。(2)推进供给侧改革,化解实质性过剩产能。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钢铁等传统部门快速发展,并进入周期性能过剩阶段。1950年代通过“公开销售制”控制产量和价格,1960年代试图控制过度扩产和过度投资,均以失败告终。最后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扩大内需,化解产能。1978年政府制定《特定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采用行政手段,处理过剩设备、控制新增设备及建立萧条卡特等,化解高耗能、高污染的“结构性萧条行业”过剩产能。制定“特定萧条产业离职者临时措施法”和“特定萧条地区中小企业对策临时措施法”避免大规模失业。(3)鼓励兼并重组。1990年代,日本进入钢铁产能出清加速期。合并工厂集中产能,集约化改造生产设备,共享能源资源,优化利用运输基础设施,互用副产物废料等,发挥协同效应,国际竞争力增强。2000年前后进入兼并重组浪潮,日本钢管与川崎制铁协作合并为日本钢铁工程公司,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强强联手合并为新日铁住金,行业集中度上升,企业盈利改善。(4)强化人才培育。一是健全企业劳动力雇佣体制。日本企业劳动力通过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配置,具有组织机制色彩。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及内部晋升制等促进劳动力在企业内部流动,形成日本雇佣体制,增强企业凝聚力,劳动力就业稳定,提高企业生产经营及研究开发效率。二是实施产业技术人才培养免税制度激励。经济产业省负责培训制造现场的高水平技术人才。2005—2012年,日本实施《人才投资促进税制》,将国家资金与企业培训结合,对企业培训人才实行税收优惠。三是通过教育培育吸引人才。1880年,日本率先在世界普及6年义务教育。近代日本持续重视教育,成为世界教育强国。日本近年吸引国外留学生成为支撑国内新兴产业的重要人才。

2. 改善营商环境,引导资本流向。

(1)提供精细化服务。一是政府型服务模式。政府出资设立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促进贸易和投资。自2003年起,机构与政府及地方自治体合作,为招商引资提供周到细致、高度可靠的服务。为支持外企落户,机构安排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与产业、法律、会计等领域的专家合作,解答企业在本地将要面临的商业惯例、监管等问题。二是设置专门投资服务机构。政府在多个城市设立综合性介绍窗口。地方政府政事厅的经济事务所负责吸引国外直接投资,通过开展宣传推广活动,推介城市优势。东京设立的对日投资商务支援中心,为客户提供市场进入建议、成本模拟测算、人才搜寻、公司的注册成立及办公场所落实等周全服务。(2)营造良好环境。一是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政府针对重点产业的外资企业提供建筑物租金资助,促进外企事业发展补助金及促进创业的税制,减轻企业初期投资负担。二是打造良好商业环境。2016年5月,日本举办“对日直接投资推进会议”,确定导入全球最快的绿卡制度等一揽子政策。设立工作组,简化监管及行政手续展开研究。加强公司治理,改善商业环境。监管改革制药、医疗器械、电力能源等领域,扩大国内商机。(3)宏观政策激励。一是提升资本市场效率水平。由于日本外国投资小于对外投资水平,2000年,日本改革商法典,提升资本市场效率水平,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迫于地方政府压力,政府及议会逐步放宽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二是降成本引导资本流向制造部门。金融危机后,国外劳动力成本增长,国内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提高,制造企业回归国内。政府实行减税、租赁、补助等政策,推动制造企业的国内投资,扩大规模,推动技术升级。同时,通过汇率和税收政策,实现日元贬值,降低法人所得税,刺激民间投资转向实体经济。

四、进一步提升上海工业效益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新兴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创造和培育新增长点

尽管上海工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效果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稳步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上海工业的信息化投入比例依然较低。上海工业信息化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0.34%。而信息化投入的多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程度的高低。上海工业新兴产业发展,一方面要紧抓国际节能环保、新材料等技术更新换代的浪潮,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设立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行业重点项目目录,通过加大重点企业扶持力度,推动行业更好更快发展;另

一方面应紧跟时代发展主线,以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大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用信息技术武装工业,提高工业的自动化水平和附加值,构建上海工业新兴产业发展蓝图。要依托上海两个国家级机器人检验检测中心,推动建立机器人行业标准,以机器人制造为引领形成先进制造业和智能制造业发展高地。

(二) 稳定企业投资预期,促进工业投资加快回升

上海未来应将投资重心转向技术升级改造投资,以及研发、数字智能、人力资源等“软”投入,增强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进一步提高工业投资效率。创新工业技改投资政策,探索通过基金、事后奖补、贷款贴息、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支持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研究将技术研发等软投入纳入支持范围,提升企业投资意愿与积极性。

(三) 加强前沿技术跟踪预测研究,提高发展动能

上海应积极制定各项政策,加快建立技术创新内生机制。一是加强前沿技术跟踪预测研究。深入调研了解当前各行业的前沿技术及发展趋势,对重要创新技术进行年度动态跟踪,借鉴“技术成熟度曲线”的制定经验,结合上海现有产业基础和技术水平,重点聚焦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领域,追踪领域前沿技术,采用新的研究工具,借助新的市场力量,形成适合上海的“前沿技术曲线”。二是建立工业企业创新基金项目,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新技术研发。按年度对申报的工业企业技术研发活动进行研判,重点支持技术先进、应用前景强的工业技术项目,支持企业积极购买先进技术。三是建立工业企业技术研发平台。充分利用市级各类研发平台、企业研发中心等,加大产学研合作,通过整合资源引导上海工业技术研发积极向国际工业技术的先进水平靠拢。四是设立技术标准专项经费。技术标准是行业发展的标杆。鼓励上海工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加大技术标准制定的研究,树立和提升上海工业重点行业在全国的地位,提高工业发展竞争力。最终实现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增强上海工业效益内生增长动力,减少对外部环境变化依赖的目的。

(四) 优化产业组织生态体系,为工业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上海既要加快国有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吸引国外高端制造业投资,也要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使民营企业成为未来上海工业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重点应完善上海“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体系,助推更多“隐形冠军”的涌现。一是构建并完善隐形冠军企业的遴选池。上海目前的专精特新培育计划和科技小巨人工程是主要的支撑战略计划,但二者的申报都有需要走申请一审批一立项的流程,才能获得支持资格。二者的实施部门分属经信委和科委,且申报条件也极为相似,这样会造成资源的重复资助与浪费。建议将二者合并为“隐形冠军”项目,集中资源精准扶持。为提高“隐形冠军”工程的推广范围,完善政府服务体系,应逐步对全市的潜在企业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建立数据库和企业池,应定期从中排查出符合申请条件企业,有针对性地提供申请指导,帮助企业提高申请效率;对于已成为立项企业甚至已结项的企业,应建立长期监测机制,跟踪了解企业的长期发展。对优秀的企业可打破地域的限制,以开放型、市场化的方式吸引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进来。二是重视“隐形冠军”品牌企业的培育。重点在于扶持一批能够专注于某一行业领域,发挥工匠精神、做精做强,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品牌,做细分市场的领导者的企业;能够坚持持续的投入、持续的创新,逐渐成长为具有国际化视野、优秀企业文化、先进管理水平的隐形冠军。三是以精准服务促进卓越企业以及独角兽企业涌现。未来,“隐形冠军”工程可以体现精细化服务的特点,根据不同的企业采取更为精准的服务。如收入规模在10亿元或以上的企业,重点解决其做强做大的需求,在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上提供支持,积极推动其上市,助力其脱颖而出,使其成为细分行业中的“隐形冠军”。对一些中小规模的企业,鼓励其做特色,成为产业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网络节点企业。对一些需要进行技术攻关和突破的制造业企业,政府可以多搭技术交流的平台,促进其技术的快速进步;对一些服务类企业,政府应更多地为其业务的创新和拓展降低相应的制度成本、搭建业务对接的平台,助其开拓业务的领域。

(五) 创新产业跨界治理体制,以有效制度供给推动工业动能再造

当前,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些融合型产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模式的深刻变

革。不仅催生了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等经济新动能的涌现,而且对经济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创新产业跨界治理体制机制,是增加有效制度供给的重要方面。针对未来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以及产业管理业务交叉情况更加突出的现状,应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协调机制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不同属性的各类跨界问题。产业融合发展对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新要求,要建立优化包容性创新体制机制,从管制型政府向学习型、创新型和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与时俱进,注重研究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根据新趋势、新特点创新政府管理的重点和方式,减少土地指标等行政性直接干预手段,减少融合发展新行业的前置性审批,加强对服务市场的一线监管,加强市场监管的事中跟进评估、反馈调整和事后监管。产业的跨界会涉及不同产业、技术领域的交叉,针对政府部门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问题,需要通过机构合并、职能整合、信息共享、监管共认等方式,创新大部制、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工作领导小组等创新机制,并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等优化监管手段,实现政府监管“无缝对接”,形成多部门联动的常态化。

(六)完善顶层设计,推动郊区工业布局的优化、融合发展

通过完善产业之间的关联机制,实现上海郊区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是有效促进城区服务向郊区的辐射,提高郊区制造业规模化、国际化、信息化水平。二是着力推动郊区制造业的“主辅分离”,引导大型制造企业提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能力,积极拓展技术研发、品牌运作、集成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三是鼓励制造企业有针对性地剥离服务部门,以产业链整合配套服务企业,推进服务向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方向发展。针对当前产业园区在产业集聚方面的优势,完善服务配套平台的建设,注重制造、服务产业生态系统的建设,提升产业的融合发展能力。加快完善产城融合相关规划。产城融合不仅要将新城和工业园区在规划上合二为一,更要注重功能上的契合,使工业园区真正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规划部门应联合产业部门、建设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共同编制和完善相关规划,合理分布城市的产业和人口,使城市的形态和功能能够顺利实现,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抓住上海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机遇以及服务业向郊区扩散和转移的机遇,积极促进产业结构由“粗”向“精”转化、由“硬”向“软”转化、由“重”向“轻”转化。在工业园区片区加快建设必要的教育和医疗设施,就近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就学、就医问题;加快建设公共租赁住房、集体宿舍等居住设施,就近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问题;加快建设轨道交通以及连接工业园区片区和新城其他片区的公交线路,改善产业园区对外交通状况。同时,新城要加快引进市区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维持合理的商品住宅价格水平,增强对中产阶层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 [1]王媛媛. 美国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经验及启示[J]. 亚太经济, 2017(6).
- [2]张思锋, 王舟浩, 张立. 政府与市场:理论演进、美国改进、中国改革[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15(35).
- [3]刘厚俊. 20 世纪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体制、政策与实践[J]. 南京大学学报, 2000(37).
- [4]盛朝迅. 化解产能过剩的国际经验与策略催生[J]. 改革, 2013(8).
- [5]蒋绚. 政策、市场与制度:德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与启示[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1).
- [6]克里斯托弗·艾伦. 理念、制度与组织化资本主义一两德统一 20 年来的政治经济模式[J]. 国外理论动态, 2015(10).
- [7]薛彦平. 德国经济治理的回顾与前瞻——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J]. 当代世界, 2014(10).
- [8]吴勇军, 王洋. 德国化工行业绿色转型及启示[J]. 安全、健康和环境, 2015(15).

[9]德国政府是如何招商引资的?[N]. 南方日报, 2016-09-26.

[10]智瑞芝, 袁瑞娟, 肖秀丽.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动态及政策分析[J]. 现代日本经济, 2016(5).

[11]阎莉. 日本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探讨[J]. 日本研究, 1998(4).

[12]蔡秀玲, 余熙. 德日工匠精神形成的制度基础及其启示[J]. 亚太经济, 2016(5).

[13]六个国家地区招商引资成功经验分享[EB]. 微信公众号: 市县招商网, 2016-03-15.

[14]尹小平, 崔岩. 论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异同[J]. 税务与经济, 2010(3).

[15]张云逸. 上海工业经济效益评价研究[J]. 中国城市化, 2016(9).

[16]周效门等. 对上海工业经济当前及中长期发展的几点研判[J]. 科学发展, 2018(2).

注释:

1 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缺少销售收入数据, 这里采用的是工业企业的销售产值数据进行计算得到, 销售利润率和销售税金率的实际数据应该大于此处的数值。